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YUN DONG SHI LIAO BIAN NIAN

刘长鼎 陈秀华 编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17—1927

上 编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1917 年—1927 年)

刘长鼎 陈秀华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

刘长鼎 陈秀华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 字数:220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 7—81032—576—0

I·32 定价:精 20.00 元
平 16.00 元

前 言

文艺运动、文艺思潮、文艺思想斗争，现代文学史上常常被提到的这些名词，留给了人们许多无尽的话题。

在世纪末回眸文艺运动的那段历史，依次著录有关的论辩文章，“既作为一篇总账，让大家温习，也作为一面镜子，让大家照照，该不是没有意义的罢？”（茅盾语）

八年前，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搜集、查阅当时的出版物，从繁乱芜杂的期刊杂志中扒剔文学运动的史料，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不厌其详地做了臚列和摘编，以期给读者提供较为客观、较为真实的那个时代文学运动的全貌！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收录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关文学论争、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期刊等重要史料，考订了文章发表的期刊和时间，以便于读者查找和检索。

限于水平、限于资料、限于信息，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太原

例 言

一、这个编年，分上、中、下三编，各编起迄年月为：

上编：一九一七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

中编：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下编：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二、本编年严格按年、季、月、旬、日的顺序编排。日无法考订的为旬，旬无法考订的为月，依次类推。

三、编年中的各条目，均以原文刊出的时间或事件发生的时间编排，少数条目因行文的需要除外。

四、同一时间下的几个条目，用1、2、3……分别标出。

五、一些专题讨论或论争，如条目不多，前后间隔时间又长，为便于查找，则集中编排。

六、因内容重复或因资料原因，一些条目未做内容摘录。

七、少数条目下，以“附录”的方式转载了一些重要论述、回忆或资料，以便于读者对某一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

八、每月的正文前，都编写了当月社会历史背景或重大社会事件，以供参阅。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太原

总 目

前言	(1)
例言	(1)
上编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九二七年四月	(1—295)
中编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1—448)
下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十月	(1—438)
后记	(441)
附录	(444)

目 录

(上编)

一九一七年.....	(1)
一九一八年	(15)
一九一九年	(34)
一九二〇年	(63)
一九二一年	(80)
一九二二年.....	(117)
一九二三年.....	(170)
一九二四年.....	(200)
一九二五年.....	(222)
一九二六年.....	(254)
一九二七年.....	(286)

一九一七年

— 月

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一日

1、胡适作《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二卷五号。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文章还强调文学必须有情感，有思想。“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浓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倡导“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刻意摹仿古人乃是“文学下乘”。认为无病呻吟的文学是“亡国之音”。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本文寄自美国。作者说，这是留美学生长期讨论白话诗文的结果，而我“自己把许多散漫的思想汇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胡适自传》第128页）郑振铎先生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中认为，胡适的《刍议》：“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

2、陈独秀作《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二卷五号。

二十八日

《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章士钊主办。李大钊曾任编辑。二月十七日改为周刊。

三十日

守常(李大钊)作《孔子与宪法》。载《甲寅》日刊。一九一六年秋，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宪法草案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因此受到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思想，宣传民主和科学为中心内容的运动。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尊孔”，“诋击”孔教。本文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将孔子列入宪法，“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本月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约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东安门箭杆胡同九号。迁京后的《新青年》，逐渐和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集合起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二 月

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亲日派力主中国参加欧战，以黎元洪为代表的亲美派则反对参战，二十三日，冯国璋入京调停段、黎之争。

一日

1、吴虞作《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载《新青年》二卷六号。

2、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二卷六号。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实行“三大主义”：“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辈”，而断然加以排斥。“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文章还指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并主张“自然主义文学观”。

陈独秀所揭橥的“三大主义”，开始触及到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从这一时期起，由《新青年》发难，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复、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人互相呼应，互相讨论，逐渐形成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新的势头。

3、胡适作白话诗八首。载《新青年》二卷六号。这是《新青年》在提倡文学革命时，首次刊登的白话诗，具有一定的影响。

4、钱玄同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二卷六号。呼应文学革命主张，指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信中说：“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陈独秀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

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

注：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及其他刊物时，常辟“通信”一栏，与读者通信讨论问题。《新青年》每期均有陈独秀与读者的通信，多达三十九封。

八日

林纾作《论古文之不宜废》。载上海《民国日报》。反对提倡白话文学主张，维护古文的正宗地位。说：“民国新主，士皆剽窃新学，行文古文亦绎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诃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学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学已先亡”。然古文何以不当废，林纾只表示“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三 月

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加欧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北京政府宣布与德绝交。

一日

1、钱玄同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三卷一号。就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信中说，胡适“不用典”的论说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弟意今后文学，凡

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信中认为：“律诗可废”，文章的“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信中还肯定了白话文章的价值，指出“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赞同胡适以“情感”“思想”两事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说：“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惟此皆就文体言之耳。若论词典小说诸著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君‘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无此两事之词典小说，其无价值亦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相等。”信最后还指出梁任公是“现代文学之革新”的重要人物，他在新文学历史上的地位。这封信，响应、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基本论点，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呼声，是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文字。

2、佩剑青年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三卷一号。认为“斯世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孔教“一笔抹杀之，不可也。孔教非绝对的不良也。矧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各国提倡邦教，奈何先生弃孔子耶？”

陈独秀在回信中据理驳斥说：“孔教之伤于中国者，于政治、于社会、于家庭，本志已具言之。”而“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足下所谓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请更详示以理由。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记者当虚心欢迎之，决不效孔门专横口气，动以‘非圣者无法’五字，假君权以行教权，排异议而杜思想之自由也。”

“五四”前，文化、思想界在“尊孔”和“反孔”方面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至“五四”当时，遂演成“打倒孔家店”的巨大时代潮流。从这封通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尊孔”和“反孔”的一斑情况。

3、陈独秀复信俞颂华。载《新青年》三卷一号。陈独秀在复信

中据理陈言，驳斥“尊孔”的种种言论：孔子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有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又说：“若以此统一人心，而谋有以保存之、发达之，则此共和国中，尊君、尊亲、尊男之礼教，不知发达至何程度，始为美备也，愚实无以勇焉。”

《新青年》三卷一号还发表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复信三封：

《傅桂馨致独秀》及独秀的复信。

《常乃德致独秀》及独秀的复信。

《淮山逸民致记者》及独秀的复信（记者为独秀代称）。

4、《太平洋》杂志在上海创刊，李剑农主编。本刊原为月刊，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卷一期起改为双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出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停刊。该刊主要撰稿人后另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本月

1、柳亚子主编的《南社小说集》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该书主要内容表现了南社社员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的消沉和悲观。

2、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收欧美十四国四十七位作家的五十篇小说。鲁迅对该书的出版极为喜悦，并于本年十一月与周作人合拟一篇评语予以赞许。

四 月

蔡公时等在北京创办的民国大学开学。

一日

1、方孝岳作《我之改良文学观》。载《新青年》三卷二号。为了使文学改良者“有叙可循”，则不能不懂得中西文学的差异点：“（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文章说：“陈胡二君定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实为不易之论。”造成“言文不一”的理由有三个方面：（一）“国境内无外种之杂入也”，“是故数千年来，除南北朝及元清二代，大陆上纯是汉人势力。文艺学术界，既无平民之踪迹。然士大夫相习成风，文求古而言从俗，言文遂终古不得复合。”（二）“无新学术之发明也”，“我国有述古之学，无发明之学。即日用事物，亦无甚变迁。文人思想既不能推陈出新，而所用事物之名，亦相承不变。故方言虽庞杂，而文言气习近古，不可易之势也。”（三）“文人言复古也”。我国文人，以模古为特长。“人物事故，虽极新者，必以古名名之，以旧态状之。其结果遂与当时事实大相反。”但文章认为，文学改良应“姑缓其行”，“由深入浅”。如果“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字，以予观之，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

陈独秀于该文后有一段按语，说：“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

2、曾毅致陈独秀及陈独秀的复信，载《新青年》三卷二号。曾毅不赞同陈独秀揅击“文以载道”，致书陈述自己的意见：“详观尊论所指，以为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而以言之有物之物，视为文以载道之道，足下似将道字呆看。谬推足下之所以呆看，则蔽于俗传之狭小道字。”故不敢“附和于足下。”

独秀在答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当前“应首以揅击古典主义为急务”，“若仍以之载古人之道，言陈腐之物，后之作者，岂非重出之衍文乎？”

五 月

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院总理职，由伍廷芳暂代。

一日

1、胡适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三卷三号。信中规劝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问题，要容他人讨论研究。说：“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并希望国内有志于文学革命者，都来像他一样，尝试写作白话诗词，“借以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

信中还对二月八日林纾的文章《论古文之不宜废》进行抨击：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独秀在答书中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表达了对于坚持文学革命的决心和态度。

2、钱玄同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三卷三号。对《新青年》二卷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上陈独秀的《西文译音私议》“别有一种意见”，因而发信与陈讨论“译音”问题。认为：现在的西文人名地名的译法，“有佶屈聱牙难读之苦，书写之费时间，又四五倍于写原文”，实为不便。因此只有别想他法：“（一）直写原文，不复译音。（二）译音务求简短易记。”信中并首次提出中文应“一律改用横写”的主张。

陈独秀在复信中对中文改用“横写”，及“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

3、××致书陈独秀。载《新青年》三卷三号。希望改良文学之事，要“实心实力做去”，“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说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故青年杂志对于文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尤贵以毅力坚持之，不可今朝说了一番，明朝即视同隔年历本，置之不问。”

4、胡适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新青年》三卷三号。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考察唐、宋以来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今日倡导白话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并当“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使其发生、成长为文学的“正宗”。

5、刘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载《新青年》三卷三号。文章积极支持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并就散文、韵文的“改良”，全面、详细地阐述了意见：“散文之当改良者三。第一曰破除迷信。

……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绝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第二曰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峙的地位。……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第三曰不用不通之文字。”“韵文之当改良者三”：“第一曰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第二曰增多诗体”，“第三曰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此外，文章还就文学上的用典、对偶、小说为文学之主脑等发表了看法。

6、俞元潜作《读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三卷三号。

六 月

黎元洪召张勋到京共商国事。

一日

1、胡适在《新青年》三卷四号发表白话词四首：《采桑子·江上雪》、《生查子》、《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俄万岁自叙》。

2、胡适致陈独秀书。载《新青年》三卷四号。与钱玄同讨论《聊斋志异》、《西游记》、《七侠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以及《西厢记》等古典名著的评价问题。